

后知不足斋主人鲍廷爵书事述略

王 亮

晚清同光间,新式印刷技术引入国内,直接引发了图书出版和流通形态的不变。大致同一时期,苏州书商因应江南地区经济、文化重心转移的大势,陆续迁址上海,其中常熟人鲍廷爵的后知不足斋(抱芳阁)一度与扫叶山房、同文书局、点石斋、文瑞斋等并立称雄,其书业活动包括了刊书、售书、藏书三端,而以雕板汇印《后知不足斋丛书》影响最大。笔者留心其人其事有年,深觉鲍氏虽然最终事业失败,仍不失为斯时书林转型一代表人物。而其事迹却长期湮没不彰,以下试为铨次他的生平行实和经营状况,兼及他与晚清藏书家以及同业的交游、往来,冀能由此个例,呈示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演进之一端。

一、鲍氏生平行实与书业经营

鲍廷爵,字叔衡,号奂甫,祖籍歙县,江苏常熟人,自称与长塘鲍廷博为同族。父亲鲍振芳著有《金石订例》四卷、《舆地形势论》一卷,有后知不足斋藏书楼。廷爵继武先人,收采旧籍,勤加校刊,售书、刊书多用“常熟抱芳阁”名义。他以收得田庄陈氏世藏旧籍起家,最初设肆于常熟寺前街东段,结邻同业者尚有漱石山房、醉经阁等。光绪壬午(1882)年《抱芳阁书目》序有“上洋新北门外棋盘街抱芳阁仁记主人”落款,可知是年抱芳阁已在今福州路一带与诸多沪上同业为邻。同年12月12日《申报》载“新开抱芳阁书庄”广告,称“广东各省局刊本并各家藏板善本书籍及日本书籍铅印本、各坊登报之书无不该备”。鲍氏赋性开敏,擅长交际酬应,勇于任事,其事业盛期在南京、汉口、扬州均有分店,与扫叶山房、同文书局等同业都有密切往来,曾为以石版影印新法有名于世的徐润代理发行书籍事宜。光绪十二年(1886)上海书业创建公所,列名商号共29家,主要发起人为扫叶山房经理朱记荣、分号经理黄熙庭、翼化堂主人卫辅堂等,据留存的《上海书业崇德公所创建书业公所启》,抱芳阁列名位次第六,输捐款项也居前列。同年乐善堂书店主人岸田吟香致函北方心泉,称“抱芳阁的情形也颇令人叹息,能盈利的书店几乎没有。上海的市面也很不景气,书店时有新开出的,时有倒闭关门的,变幻无穷”云云,可知在当时“不景气”的市况下,同业者仍以抱芳阁书肆为标尺。

《抱芳阁书目》系售书目录,包括了局刻、家刻,铅印、石印,翻雕旧本以至东洋版等,各种类型“悉罗而聚之一编”,也包括了自刻和自藏书。民国间马叙伦《读书续记》卷一曾引述《书目》的序文,称“二十年前上海书肆贩售群籍,辄有一目以供甄择,而叙目之次,亦文士操觚,典则可观,近则风雅衰息矣”。序中还有“至于精钞秘刻虽薄有所蓄,却不敢开列,诚以此等书籍,室无副藏,恐前者快意探骊,后者按图索骥”的话,此说并非故弄玄虚,鲍廷爵藏书中确有若干精本,其最著者为宋巾箱本《十七史详节》。其中《名公增修隋书详节》二十卷,曾经季振宜收藏,后经缪荃孙、刘承幹递藏,今存重庆市图书馆,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。藏书印有“海虞鲍氏珍藏金石书画之章”、“海虞鲍氏珍藏印”、“虞阳鲍叔衡过眼”;《名公校正晋书详节》三十卷,也曾经季振宜收藏,今藏上海图书馆,书末钤“虞阳鲍叔衡过眼”印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一期收录;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宋本《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》二十五卷存六卷,也有鲍廷爵藏书印记。

鲍氏刊书内容包括经籍、小说、戏曲、医书等多种门类。也曾代为八千卷楼主人丁丙等刊刻书籍。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《管子》,光绪时邑人张瑛曾影钞,交抱芳阁覆刻。

在当时书业同行的竞争中,为了牟利侵夺版权之事十分常见。王闿运著《湘军志》为近代名著,光绪六年付刊后即遭毁板。此后翻刻本众多,笔者见到的早期版本卷端多不署作者名。有的版本则易名《湘军水陆战纪》,其中清光绪十二年京都同文堂石印的四篇十六卷本《湘军水陆战纪》流布最广,今日海内外图书馆多著录作者为“鲍叔衡”,缘由就在于书前宋相序称引鲍氏之名,遂误以为作者。京都同文堂本显然是翻印自鲍氏更早的一个本子。鲍廷爵本系盗印,且指认作者为曾国藩以广招徕,但也难免遭遇他家翻板。

光绪二十年之后鲍廷爵即不再有刊印书籍的记录。据翁同龢日记,光绪二十六年(1900)鲍氏返里设肆,至光绪二十九年常熟寺前街大火,烧去慧日头门及左右两铺,“抱芳阁烬焉”,可知他晚年境遇不佳。从当时出版业的中心上海黯然离场,可能与他经手刊印书籍全用雕版旧法,受新兴印刷术的冲击有关^①;而学识不足,用志不专,出版内容未能“与时俱进”,也是原因之一。

久之不得志,乃更游浙江,聘邑人王敬安任书契之职,盖鲍不能文也,虽欲为巧宦而数奇,金尽而书肆亦从此衰废。^②

鲍氏出版活动的盛期,在江南兵燹板荡二十年之后,于趋新之世仍能存古,对于文化赓续不无贡献;且选目精当,在同时代出版物中占一头地,当时必有博学通人为之擘划。宋相《湘军水陆战记》序称“吾友虞山鲍舍人叔衡隐沪

①陈乃乾先生曾考证最早的一部铅印丛书始于同治季年的尊闻阁主人,由申报馆排印发印,光绪三年前已出版56种。《陈乃乾文集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年,上册,第141页。

②金鹤冲:《暗泾杂录》,《常熟文史》第22辑,第101页。

上,有远略,弃帖括小家书,凡经世有用文字能如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者,锐资独播不鲜,余甚是之”,则将他的逐利行为视作有心济世,未免揄扬太过。

清乾嘉间鲍廷博《知不足斋丛书》行世后,有《仿知不足斋丛书》、《续知不足斋丛书》、《知足斋丛书》续起,踵事增华,而鲍廷爵《后知不足斋丛书》为个中翘楚。鲍氏辑刻的书籍以清代考据、辑佚著作为大宗,也有当时已驰禁的禁书,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前后近二十年陆续刊成,随刻随印,最后方将全书汇印,书前牌记样式各各不同。由于多用前人旧板,最终全书的面貌也就不尽统一。《后知不足斋丛书》版式阔大,纸用棉宣,定价不菲。《抱芳阁书目》记《后知不足斋丛书》(未完全)价洋十二元,而卷帙数倍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价洋也仅二十八元而已。续出的第五至八函较前四函更为稀见。

光绪十年,丛书第一编刻竣时,潘曾玮为作序^①,称“竭数十年之力积书百余种,或原编重辑,或影本摹刊,或得自旧传,或成于时彦”云云,大体可信。其中以得前人版刻“原编重辑”者为多,各子目卷端和少数内叶版心下多补入“后知不足斋校刊”字样。第八函中《苏米斋兰亭考》书末镌“联兴堂冯烘记刊”一行。按此“联兴堂冯烘记”在光绪间承刻的书籍不少,如医书《御纂医宗金鉴》九十卷、《中藏经》八卷(光绪六年),扫叶山房刊大字本《监本诗经》(光绪十七年),笔者过去认为承刊地点可能在上海或苏州,不过近年见到清刊《山海经笺疏》有“马岗联兴堂冯烘记刊”牌记,马岗在广东顺德,《苏米斋兰亭考》也有可能是利用当地低廉工价刻板后运回刷印的。

《丛书》第七函收录《史略》六卷,书前牌记为“光绪癸未仲春虞山鲍氏开雕”,又摹刊“五砚主人”、“五湖”、“陆氏师道”、“宋本”、“子子孙孙永保”、“长叔”、“卫泳之印”、“黄丕烈”、“茺圃过眼”、“百宋一廛”、“五研楼图书印”诸藏印。清末黎庶昌、杨守敬在日本获见宋本,光绪十年影摹刊入《古逸丛书》。两本版式、字体相近,避宋讳甚至清讳缺笔也相同,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、尾崎康、石田肇都认为《后知不足斋丛书》本是翻刻《古逸丛书》本。如此看来,鲍廷爵牌记所记年月或系刻意推前以泯其迹。

二、鲍廷爵与藏书家、同业的交游

传统中国社会中,书商与藏书家互相依存,而地位相去悬远。前者为了达成交易,除趋访、邀宴结主顾之欢心,还常常利用书业网络代主顾交递书件。鲍廷爵曾捐官得候补知县衔,以半官半商的身份,周历苏州、扬州、南京、上海、汉口、广东、四川、北京,在当时有广泛的社会联系,在时人笔记、日记、书札中每有端倪可寻,以下辑录本人所知见者,挂漏之处所在必有,尚祈方家教正。

^①潘曾玮(1818-1886),字宝臣,潘世恩第四子。官太常博士、刑部郎中、记名道员。著有《正学编疏解》、《自镜斋诗文钞》、《玉涪词》。此序潘祖同《竹山堂文集》收入,并注“代季父作”。

1. 李瀚章、李经羲

据民国间金鹤冲《暗泾杂录》，鲍氏发家经过如下：

鲍叔英，寺前街设书摊者，得田庄陈氏之书，遂以赢余于慧日寺街设抱芳阁书店，又于扬州、上海设抱芳阁。抱芳阁之书，闻于江南矣。田庄陈氏自清顺治初迄光绪凡八世为学官，弟子所蓄书籍，所谓充栋宇而汗牛马者。至陈伯生之世，家益窳，乃鬻其书。又以鬻书为耻，私告鲍，令其携舟昏黄而至，乙夜移书下舟，鲍持银币二百而载书盈舟以去。时县人潘子昭先生设帐于合肥李瀚章家，课其子经羲等。鲍载善本书因潘先生以归于李氏，有餘利焉，由是与熟识。李氏子至扬州、上海，必寓居抱芳阁焉。

其后李公（瀚章）总督四川，鲍遂纳贐求为县令，往四川求见李公，李公曰：“汝来何事？汝非为官者，盍归书铺乎。”^①

鲍廷爵书业的起落，与合肥李氏大有关涉。

2. 赵烈文

《能静居日记》光绪七年（1881）十二月二十九日：

鲍估携来明人重刻宋绍兴无注本《通鉴》。其佳处可以是正元兴文署本几百余条，真宝书也，以番银二十六饼易之，书林又增一壮观也。

赵氏饶于资，故而鲍廷爵一再携书登门，日记中屡次述及。

3. 瞿秉清

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末附丁丙致瞿浚之札第二通：

蒙允续假各籍，邮寄未便，刻鲍叔兄有来舍装书之约，特属趁前，幸祈查照来单，赐借若干部，即交叔手赍来，万无贻误也。……尊书缺卷，最好开示，叔衡来舍，遇有可配者，俾可随时抽奉也。^②

据此札可知鲍廷爵曾为丁、瞿二大藏书家邮传书物。

4. 王闿运

王闿运《绵绮楼日记》记光绪十五年至沪上，鲍廷爵曾邀约招待：

二月廿日：验郎在孔房相待，云“抱芳园书店欲请一饭，未知肯去否？”余云：“无所不可，但雨不可。”已而雨少止，复来邀，因往聚丰园，客别有四川陈垞……验郎同伴刘小山亦在坐。又有一贾客冯春江，不知何业也。设食亦甚草草，少顷即散。

同月廿一日：步出看书店，抱芳阁店主鲍廷爵言冯（春江）乃扫叶坊友也。

王闿运此时对于前文所述《湘军志》盗印公案，仍懵然不察。

5. 翁同龢

鲍廷爵与翁同龢为同乡，过从最密。翁氏日记、题跋中也屡见其名：

^①常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：《常熟文史》第22辑，第101页。

^②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，2000年，第705页。

《翁同龢日记》光绪二十五年重九日：“导游海藏寺……与杞怀饮茶，忽鲍叔衡拜于茶亭，陈苦状乞援，笑谢之。”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：“晨起至寺前街，抱芳阁书铺初开，坐片刻。”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：“晨至慧日寺，出遇鲍叔衡，拉至其书铺小坐，闲翻碑帖甚适。”

《畿书》十二卷，明晋江蒋德璟撰。国家图书馆藏旧钞本，有翁同龢题记：“己丑秋南归，于上海书肆见之，鲍叔衡购得赠余。”

6. 费念慈

前引翁氏日记中的“杞怀”即费念慈。费念慈居停上海时致缪荃孙函：

前寄《慧琳音义》两部，今始查得清楚。去冬弟恐停轮，因函托鲍叔衡，将书就近交裕通恒带津，并致严小秋一缄，附吾兄一书在内。叔衡以信交裕通恒，以书交曾君静。君静到京忘之，误以为寄蔚若者，故交蔚若。弟前月函属笙珊家兄问小秋，小秋言信在此，书却未来。今此函在笙珊处，顷已属其先寄京，又属叔衡函告蔚若。……一时疏忽，所托非人，致有此误。叔衡素称谨细，不意忽略至此。^①

鲍氏办事并无乖失，代人受过。“素称谨细”，正可见出平日情状。

7. 萧穆、王先谦

《敬孚函稿·复王益吾》^②：

盖前此抱芳阁有一分坊在汉口，以故湘、沪两头寄书皆由彼从中互递。今抱芳分坊因亏本闭歇，无人从中为之枢纽，故以后书件必由信局乃妥便。

8. 叶昌炽

《缘督庐日记钞》光绪十年十月初九日：

（杨守敬）其人之离奇闪烁，无与伦比……冀甫以为鲍叔衡、侯念椿之不如，诚哉是言也。

叶氏与杨守敬商洽买书不成，积忿成訾。冀甫即查燕绪（1843-1917），号继亭，海宁人，当时居中作介。侯念椿为湖州人，苏州元妙观世经堂书肆主人。

《日记钞》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九日：

午后偕（黄）再同至抱芳阁书坊，访鲍叔衡未见。架上皆新册，无可寓目。

9. 汪康年

《汪穉卿笔记》卷七《雅言录》^③：

癸未正月，余随石星巢师入都，过上海，阅书抱芳阁。先生见汲古阁初印本《六十家词》，卷端有查初白先生姬人小印。先生大喜，以四十元得

①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354页。

②《历史文献》第7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72页。

③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252、258-259页。

之。余乏资，偶阅架上，见有写本曲目表，抽视之，则镇江支君所编，有钱梅溪先生序，遂购以归，仅小银元四角耳。后为江建霞同年刻入《灵鹫阁丛书》中。

朱（仞千）言获卢（文韶）抱经堂书于抱芳阁，计百柜，价才二千金耳。复益以他所得，俨然藏书家矣。

10. 姚觐元

姚觐元《咫瞻日识》未刊稿（上海图书馆藏）光绪九年四月十五日：

从抱芳阁购得毛抄《六艺纲目》二册，以雌黄校识，字不甚精。上有“宋本”及“甲”字印，并毛氏名字，及汲古阁主人印，其直四元。又初印《词学丛书》（缺《日湖渔唱》一卷，《补遗》、《续补遗》各一卷），直三元。

姚氏自鲍廷爵处所见书籍，还有《图书集成》万卷本、景宋刊《管子》暨毛钞《宋人小集》等。

11. 丁丙

鲍廷爵曾助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刊书二种。事见丁立中《先考松生府君年谱》卷四光绪十九年五月“刊《万历钱塘县志》于粤东”下小注：

府君购得刊本，时鲍叔衡别驾需次粤东，因继《仁和志》并付刊行。

明聂心汤撰《万历钱塘县志》，为钱塘县志最古之本，丁氏得书后大概因广东刻书工价一向低廉，交鲍氏代刊，列为《武林掌故丛编》第十六集；明沈朝宣撰《嘉靖仁和县志》载入《丛编》第十七集。两地书业间一度存在的这一联动关系，有待于进一步考索。

12. 徐润

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光绪十一年乙酉（1885）条下记载：

广百宋斋经理王哲夫先生并朱岳生、许幼庄，以铜版、铅版选辑《朱批雍正上谕》、《九朝圣训》、《四书味根录》、《四书文富》、《绘图三国演义》、《聊斋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石头记》及缩本《康熙字典》，分售于上海，并托“抱芳阁”寄销。……是年秋，金陵乡试，又托“抱芳阁”鲍叔衡设分局于南京，代售各书籍。七月中到宁，开市二十天，各书均已销尽。^①

铅印本国内行世之初，抱芳阁在沪、宁倾力助销，洞见商机，颇具胆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复旦大学图书馆

^①民国十六年香山徐氏铅印本，页十二。